

第十三章

避免中国在走向繁荣的路上出现经济崩溃

胡永泰

引 言

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预测中国经济前景黯淡和失败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例如，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专家 Nicholas Lardy（1998）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强调中国银行体系出现资不抵债和破产可能性，并认为从中期来看，中国银行很可能出现挤兑并导致金融部门崩溃。进入 21 世纪，Gordon Chang（2001）又作出此类预测，他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将会崩溃。

这两个可怕的预测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2001 年之后，中国的 GDP 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加速增长。Lardy 错了，虽然中国的银行实际上已经破产了，但是拥有它们的政府却并没有破产，而且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救助它们。政府强有力的财政能力使得储户去银行挤兑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Gordon Chang 也错了，因为 WTO 成员国的身份使得中国对 FDI 更具有吸引力，因为这确保了中国产品更顺利地进入美国市场，而不必等待美国国会每年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MFN）身份进行审查讨论（McKibbin 和 Woo，2003）。

虽然这些中国经济失败论者们的预测迄今为止都是错误的，我们却不能保证这些预测在未来也不会成真。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可以排除出现失败和崩溃

的可能，因为这些预测者们可能仅仅是在他们判断这些失败具体会从哪个方面发生上出现了错误。本章首先对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作出评估，然后提出一些有助于中国克服这些障碍的建议。

中国走向繁荣的崎岖道路

考虑到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那些预测中国经济失败和崩溃的预言着实令人惊讶。事实上，现在热情洋溢地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乐观的观点远比轻视和悲观的观点更具普遍性。例如，高盛的 Jim O'Neill 等人（2005）预测说，中国的 GDP 将在 2040 年超过美国，尽管他们认为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会逐步由 1979 ~ 2005 年的年均 10% 下降到 2030 ~ 2040 年的年均 3.8% 的水平。^①

2006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有关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出现的对中国经济的乐观主义和传统上的悲观主义。六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承诺中国共产党到 2020 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种提法显示出的最显著的一个含义是：现在中国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可能无法引领中国进入一个和谐社会，或者至少无法足够快地达到和谐社会。

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的不和谐因素中，包括全国各省之间和各省市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日益严重的人口和环境问题、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不完善以及严重的腐败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在法治前提下构建的民主社会、一个以平等和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一个诚信和充满爱心的社会、一个稳定而又充满活力和秩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过去 30 年中国的经济可以被比作一辆不断加速的汽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 2006 年看出这辆车未来可能出车祸，因为多处存在隐患可能造成故障并导致经济崩溃。具体来说，主要可能产生三种故障：硬件故障、软件故障和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

“硬件故障”是指一种经济机制的垮台，我们可以将之比拟成汽车底盘

① 对中国 1978 ~ 2000 年的高速增长的解释的争论，以及当由一个中央计划制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苏联地区那样经历经济衰退这一类讨论，详见 Sachs 和 Woo（2000）与 Woo（2001）。

散架。可能的硬件故障包括一次会导致信用崩溃的银行业危机、一次可能导致需要削减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出的预算赤字（而且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收支平衡出现问题），这种故障还包括政府干预导致非效率情况逐渐累积，最终致使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等现象。

“软件故障”则是指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这常常会导致广泛的社会动乱并扰乱整个社会生产，也会打击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和车内的人打架导致汽车出现车祸有些相似。软件故障可能会源于目前的高增长战略正在不断产生很多不平等和腐败现象，而这又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乱。同样的，软件故障还可能源于政府没能有效应对不断上升的社会期望，从而导致社会和经济混乱。

“能源供给故障”（或者我们称为“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是指由于遇到了内在因素的限制或者外在施加的限制，致使经济无法继续前进，这种情况类似于汽车燃料不足（内在限制），或者遇到了外人设置的路障（外在施加的限制）。这类故障的例子包括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导致的中国出口的下滑。

在可能导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下去的每种故障之中，都存在很多事件，这远远超出了本章的范围。我们将把讨论限于在 2010 年 6 月的时候看起来较有可能发生的那些问题上。

潜在的硬件故障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会面对两个主要的潜在的硬件故障：财政政策弱化和生产增长率放缓。为了研究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问题的来源，我们首先需要回顾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并回忆一下这次危机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的，然后，我们还要回顾一下中国是通过何种类型的经济机制使得 2009 年的 GDP 增长率达到令人震惊的 8.7% 的水平。

全球金融危机于 2008 年 9 月 15 日于世界范围内爆发，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那一天宣布破产。这个事件对流动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大批资金撤出，致使全球金融市场崩溃。这一扩大化的金融事件反过来又影响到总收入水平。2008 年第四季度，美国和英国的 GDP 增长率（同比）都变为负数，其中美国为 -1.9%，而英国的数据为 -2.1%。

对于中国来说，主要发达国家的 GDP 骤然下滑进而转化成为一次巨大的、突然的外来冲击，这种冲击包含两个部分：负向的出口冲击和负向的

FDI 冲击。^① 这次冲击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发生在中国经济本身已经开始放缓的时候，当然，中国经济的放缓是 2007 年 10 月中共十七大提出要立即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的。在十七大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逐步使 GDP 增长率由 2005 年的 10.4% 上升到了 2006 年的 11.6% 和 2007 年的 13%。而接下来，在紧缩货币政策影响下，2008 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下降到了 10.4%，2008 年第四季度为 9.6%，2009 年第一季度更进一步下滑到了 6.1%，当然这其中出口和外国投资大幅下降所带来的挤出效应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抵消外部紧缩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的回应是推出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2008 年 11 月初，中国政府宣布推出一个 4 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于 2009 ~ 2010 年实施，投资额约占这两年 GDP 总额的 7%。而货币上的宽松则更为明显，2009 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数量增长了 28%。

虽然 2009 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令人放心的 -0.7%，但是“从全国来看，土地价格……在 2009 年几乎上涨了一倍”（“中国要求银行收紧对地方政府的贷款”，《纽约时报》，2010 年 2 月 25 日）。2009 年房地产交易总额较 2008 年上升了 80%（“市场不相信人们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恐惧”，《纽约时报》，2010 年 3 月 4 日）。^② 2010 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土地价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在几个主要的沿海城市。^③ 2010 年 4 月中旬，中国政府出台了收紧第二、三套房房贷的政策，希望以此来稳定地产价格。

快速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对于非经济手段（例如限制购买）的运用都是一些深层经济问题的症状，而如果中国经济想要在长期内持续增长的话，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具体来讲，房地产业的繁荣是 2008 年 11 月开始实施的 4 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的整体投资繁荣的一部分。在这 4 万亿投资计划中，中央政府只计划出资其中的 1/3，这样一个事实

① 以同比数据来看，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在 2008 年 11 月突然变为负数（-2.2%），而且在 2009 年 11 月继续保持负数。FDI 增长率同样在 2008 年 11 月突然下降为负数（-36%），而 2008 年 10 月的 FDI 增长率还为 35%。2009 年 11 月，FDI 增长率继续为负。FDI 增长率 2009 年 8 月至 2010 年 4 月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② 该篇报道同样指出在上海有人以每栋 45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联排别墅。

③ 2009 年，上海市土地价格上涨了 200%，广州则上涨了 400%，温州更是上涨了 876%（“中国：没有一个家”，2010 年 2 月 21 日《金融时报》）。

可能会使人们认为，这项经济刺激计划只是政府创造足够的激励措施促进投资达到所提出的水平的一项工作议程，但这种解读是错误的。对此项经济刺激计划恰当的解读应该是：中央只是允许额外的投资达到规定的水平。

对政策的不同解读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还是由国家控制和所有的^①，而这部分经济中的主体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还有其他目标。由于国家控制的企业（SCEs）在其投资失利的时候常常能够得到国家的援助，所以国家控制的企业和地方政府会患上“投资饥渴症”，这会导致利率无弹性现象出现。由政府委派的国家控制企业的负责人总是热衷于扩大企业的经营领域和范围，因为这会给他（或者她）个人带来三个主要的好处：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可以掌控更大的局面，那么也就有更大的获得提升的可能；企业规模扩大将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赞助能力”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同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潜在来源。与此相类似，地方政府的领导们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而热衷于使他们所管理的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

在中国的金融业中，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当国有银行扩大放贷规模以适应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高涨的投资需求的时候，一种“流动性探戈”（是指流动性强烈波动的现象，如探戈一般）现象就产生了。而一个长时间的“流动性探戈”必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高通货膨胀和不良贷款（NPLs）^② 增加。1996~2001年，时任总理朱镕基严厉惩处出现不良贷款的国有银行负责人，使得这种“流动性探戈”几乎绝迹。其实事情的关键在于，无论什么时候，当国有银行的经理觉得自己受到的是一种软预算约束的时候，他们便会乐于扩大贷款规模，因为放贷规模的提高可以给他们带来前文所提到的那三种好处。

目前，中央政府主要有两套制度来防止“流动性探戈”失去控制。一个是规定所有的大型项目都需要经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准。再一个是所有银行都分配了信贷配额。

所以，当温家宝总理批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提出中央只承担其中的1/3的投资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发放许可证：（1）允许国有企

① 国家控制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那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具有控股权的上市公司。

② 更详细的关于自1978年经济放权以来经常性的救助国有企业（也被称为政府的软预算行为）怎样导致经济更易出现通胀的讨论，可以参考Woo（2006）。

业和地方政府增加投资以抵消私人部门购买力下降带来的影响；（2）允许国有银行扩大必要的放贷规模从而为被批准的项目提供资金。这其中也包含了使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成功的机制：通过最大化释放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能力来刺激总需求。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被国家赋予了任务，如果将来某些被指定的项目失败的时候，企业和银行的管理者们也就可能无法完全被追究责任。

意料之中的，公众媒体偶尔会指出，某些行业的新投资导致生产过剩（例如钢铁、水泥、铝等）、炫耀性投资（例如宏大的城市中心区建设、高速铁路投资以及某些政府机构大楼的建设）、某些项目资金的私有化（例如大规模采购政府用车）。^① 人们对这项经济刺激计划的另一个担忧在于，国有银行正把流动性洪水导入国有企业之中，却忽视了全球金融危机下私人部门日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迫于营运资本短缺的压力，两家知名的私人企业——日照钢铁和蒙牛集团，都不得不同意被国有企业收购。

尽管中国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成功地使中国摆脱了不利的外部冲击带来的紧缩影响，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计划也将在未来造成两个潜在的“硬件故障”。

第一个“硬件故障”是，这项经济刺激计划会使未来国家的财政位置弱化。2009年，许多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是通过地方政府建立的8000多家本地的投资公司实施的。据估计，这些投资载体的贷款额占到了2009年GDP总量的51%（当前中央政府债务只占GDP的20%）。^② 最近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国有企业的贷款再度增长，有可能会产生更大规模的不良贷款。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应该看到，不良贷款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的问题，也是一个财政问题。美国和英国在2008~2009年救助它们的金融体系的行为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考虑到中国的“流动性探戈”现象的历史，我们很担心此次经济刺激

① 可以参考 Forsythe (2009)；“中国：没有一个家”，2010年2月21日《金融时报》；“审计发现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存在资金乱用现象”，*Financial Chronicle*，2009年12月29日，〈<http://www.mydigitalfc.com/news/china-audit-inds-misuse-funds-tied-stimulus-821>〉；“中国扩大审计者的权利以应对经济刺激计划中出现的腐败问题”，2010年2月21日《中国日报》（海外版），〈<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1/90776/90785/6898354.html>〉。

② 51%这一数据是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得出的：Shih (2010) 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债务占到了GDP的20%，而《金融时报》（“中国对不断增长的土地贷款威胁提出警告”，2010年3月28日）报道说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71%。

计划中放出的大部分贷款最终都会成为不良贷款。^①而最终的金融危机也可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像 2009 年的美国和英国那样几近崩溃，除非中国政府再一次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就像 1998 ~ 2003 年那次一样）。如此大规模的资产重组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国家将不得不减少在其他方面的投入。^②

2009 ~ 2010 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引发的第二个潜在的“硬件故障”是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增长减缓。除非国有部门 2008 ~ 2010 年的扩张（有时还是以损害私人部门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能够被私人部门的大规模增长所取代，否则，从 1949 年至今的历史来看，我们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认为温家宝总理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通过扩大产能来提振经济的做法不会拖缓未来的生产力增长（“共产党需要放松对中国的控制”，《纽约时报》，2010 年 3 月 2 日）。^③

潜在的软件故障

一个市场经济体若要顺利运行，需要一系列广泛的监管机构，包括简单的宣扬法治的机构和复杂的法律裁定机构。中国的增量改革策略和旷日持久的制度改革都意味着，中国的许多监管制度和机构是缺失或无效率的。这导致很多领域在管理上的失败，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消费者和工人福利遭受的损害。

中国在保证食物供给和医药产品的安全性方面一直都存在着监管上的问题。为降低生产成本，在牙膏^④、治疗咳嗽的药品^⑤和动物饲料中^⑥中添加有

① 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 2003 年政府第二次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以来，不良贷款比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因此他们认为国有银行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它们的内部激励和风险评估能力，高不良贷款比率也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就宣称国有银行改革取得成功还为时尚早，因为 2003 ~ 2009 年是一个贷款快速增长的时期。

② Tong 和 Woo（2006）分析研究认为国家持续地对国有银行注资削弱了财政的稳定。

③ 关于国有企业是以私人领域的退步为代价来取得增长的这类讨论通常被冠以“国进民退”（即国有部门扩大而私人部门收缩）的称号。

④ “中国对被污染的牙膏展开调查”，2007 年 5 月 22 日《纽约时报》；“中国禁止在牙膏中添加有毒的工业溶剂”，2007 年 7 月 12 日《纽约时报》。

⑤ “从中国到巴拿马：有毒药品的轨迹”，2007 年 5 月 6 日《纽约时报》。

⑥ “动物饲料中的掺入杂物在中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007 年 4 月 20 日《纽约时报》；“宠物食品领域再次出现化学添加剂”，2007 年 5 月 9 日《纽约时报》。

毒的化学制剂^①，儿童玩具中大量使用含铅颜料^②，而渔业中也存在着过量使用抗生素的问题^③。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是造成这些监管问题的主要原因。大家熟知的一个事件是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其承认受贿并帮助药品和食品生产企业拿到产品生产许可证^④。

在保护劳动者方面，中国也存在着明显的监管问题，尤其是在职业安全和工资支付领域。最近发生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涉及强制劳动的事件是，陕西省和河南省出现绑架儿童去黑砖窑工作的事件^{⑤⑥}。《中国日报》官方报道称“在中国中部地区可能有高达 1000 名儿童被卖作奴隶劳动力”^⑦。而一名试图进入黑砖窑寻找自己孩子的家长发现当地警察不仅不愿意提供帮助甚至还向他索取贿赂^⑧；在事件的另一方，当地村主任的儿子是这座砖窑的所有者^⑨。

这些关于黑砖窑奴隶劳动力的新闻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两个令人极度失望的信息：一是这种可悲的状况已经持续了近十年^⑩；二是“随着中国人口拐卖变得日益严重，强制劳动和性剥削现象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⑪。公安部高级官员尹建忠（音译）承认，目前中国拐卖人口问题有恶化的趋势，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法律体系和劳动体系中存在漏

① “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具被召回，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中国”，2007 年 6 月 19 日《纽约时报》；“火车出轨了”，2007 年 6 月 19 日《纽约时报》；“费雪公司宣布召回 150 万件中国制造的玩具”，2007 年 8 月 2 日《金融时报》。

② 第一篇文章还报道了召回一款用煤油填充的假眼球，以及召回可能导致窒息危险的一款儿童手链。

③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 5 种来自中国的海产品销售”，2007 年 6 月 29 日《纽约时报》；“一项棘手的、痛苦的贸易纠纷”，2007 年 7 月 3 日《纽约时报》。

④ “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因受贿被判死刑”，2007 年 5 月 30 日《纽约时报》；“对于这两名儿童来说，这种药品禁止的太晚了”，2007 年 7 月 13 日《纽约时报》。

⑤ “中国将调查胁迫劳动事件”，2007 年 6 月 16 日《中国日报》（海外版）。

⑥ “中国的奴役劳动丑闻导致公众要求有关官员辞职”，2007 年 6 月 18 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工人们像被关进监狱一样被囚禁起来，有恶狗看管而且经常被打……那些被解救出来的工人在电视屏幕上展示了他们化脓的伤口和瘦弱憔悴的身体”。

⑦ “中国黑砖窑中被胁迫的儿童劳动力可能多达 1000 人”，2007 年 6 月 15 日《中国日报》海外版。

⑧ “关于被胁迫劳动的报道震惊了中国”，2007 年 6 月 16 日《纽约时报》。

⑨ “5 人因强制劳动案件被逮捕”，2007 年 6 月 18 日《纽约时报》。

⑩ 这一观点来自于中国广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南方都市报》；“中国的奴役劳动丑闻导致公众要求有关官员辞职”，2007 年 6 月 18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

⑪ “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制卖淫、劳动”，2007 年 7 月 27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洞……具体来说，刑法在打击拐卖人口方面只保护妇女和儿童，忽略了成年人和十几岁的男性。目前还没有相关法规可以惩罚这类强迫被拐卖人口劳动和卖淫的行为”。这些法律漏洞也支持了我们的这一争论：当前政府监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

但是，监管机构的玩忽职守并非造成当前中国社会紧张的唯一原因。当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尽管可以取得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也造成社会高度紧张，因为在过去的 10 年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在减少极度贫困方面是失败的，甚至还极大地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Woo 等，2004；Démurger 等，2002）。亚洲开发银行 2004 年发布的一份关于亚洲 22 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情况的研究报告显示，只有尼泊尔的基尼系数（47.30）高于中国（47.25）。同时，2004 年，中国最富裕的 20% 人口的收入与最贫困的 20% 人口的收入之比（11.4）是亚洲最高的，而且远高于第二高的尼泊尔（9.5）。中国可能是当今亚洲最不平等的一个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显著地降低贫困。但是现在，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许多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机会。他们首先需要的是获得一些帮助（例如通过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介入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以使他們有能力去接受这些工作机会。

此外，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催生出大量挪用国有资产、霸占土地用作工业发展以及贪污腐败的机会，因为中国目前缺乏一个有效监管政府工作人员的机制（Woo，2001）。这些情况必然使社会和谐难以持续。

如果中国具有更好的管理体系的话，发生公共事件的数量会很少。如果政府的行为受到独立机制的严密监控或者政府对于自己的表现更有责任心的话，那么政府在前期就会努力调节斡旋，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政府工作人员也会减少权力的滥用。

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这辆车正面临两个最主要的“能源供给方面的故障”，亦即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和环境危机。大家普遍认为二者之中贸易保护主义更可能在中期导致经济增长出现问题，在得出结论之前下文将主要集中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而且作者对于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分析（Woo 等，2007；Woo，2008）。

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空气质量变得极差，也正在污染越来越多的水源，可能也正在改变中国的气候。

水资源短缺是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威胁。^① 目前，中国每年消耗可用的 8000 亿 ~ 9000 亿立方米水中的 65% ~ 75%，而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78% ~ 100%^②。当前的水资源状况已经非常危急，因为水资源的分配很不平均，而过去 15 年的降雨量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现在，“中国的 660 个城市中大约有 400 个城市面临水资源匮乏的局面，其中 110 个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③④}。

随着中国北方旱季的延长、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抽取地下水，这导致地下水位每年下降 3 ~ 6 米^⑤。运用卫星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北方北纬 36° 地区正在“以每年两毫米的速度下沉”^{⑥⑦}。具体来看，“上海、天津和太原是最严重的地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已经分别下沉了两米以上（6.6 英尺）”^⑧。黄河的命运就反映出了中国北方水资源的总体状况，“黄河自 1972 年开始每隔几年就干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干涸的持续时间不断加长，几乎整年都有数百公里的河道是干涸的”^⑨。

但是，水资源短缺和不断加重的水资源污染并非是威胁中国北方经济唯一严重的环境问题。由人类造成的沙漠化日益严重。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1999 年时中国国土的 28% 面临沙漠化，37% 面临着水土流失的危险。这份报告指出，沙漠化面积的 65% 都是由“过度开垦、过度放牧、采伐森林和落后的灌溉方式”造成的^⑩。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沙尘暴的出

① 大气污染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世界银行确认的全球 20 大空气最脏的城市中，有 16 个是中国的城市。令人震惊的是空气中有毒的铅和汞含量要比预期的高，详见“中国的经济奇迹包含着汞的威胁”，2004 年 12 月 18 日《金融时报》；“毒气在繁荣发展中的中国扩散”，2006 年 9 月 30 日《华尔街日报》。

② “高层官员警告称将出现水资源危机”，2006 年 11 月 7 日《南华早报》。

③ “中国可能会一直高温和干旱”，2004 年 1 月 3 日《海峡时报》。

④ 据报道，山西太原和天津的水资源短缺是最严重的（Becker, 2003）。

⑤ “中国北方城市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而出现下沉”，2001 年 8 月 11 日《南华早报》；Becker (2003)。

⑥ “中国北方正在下沉……而南方在上升”，2002 年 3 月 18 日《海峡时报》。

⑦ 根据 Becker (2003)，“天津市将近 60% 的土地处于危险之中”。

⑧ “包括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都在缓慢下沉”，法新社，2004 年 7 月 23 日。

⑨ “中国可能会一直高温和干旱”，2004 年 1 月 3 日《海峡时报》。

⑩ “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而人类是罪魁祸首”，2002 年 1 月 30 日《南华早报》。

现频率大增^①，而沙尘暴“对中国北方的航空运输造成了巨大影响，损害了许多高科技制造业，同时造成人们的呼吸系统疾病。这种影响已经远达日本、朝鲜半岛甚至美国西部地区”^②。根据水利部副部长陈来的估算，“根据目前中国控制水土流失的能力来看，中国需要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控制水土流失并使生态系统恢复正常”^③。

中国北方正在变得越来越干旱而且正经历着沙漠化，另外，大自然似乎在补偿我们或者嘲笑我们：自1998年开始，中国南方几乎每年夏天都会被大雨侵袭并带来严重的洪水，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④中国北方的干旱和南方的洪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事件，二者可能都是由中国的污染所引起的关联事件。我们在下文中将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更多的探讨。

很明显，没有水的话，经济增长也不能持续。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中国政府2002年开始实施毛泽东1952年就提出的建造三条运河来把水引至北方的设想：一条是东部沿海的运河，将水由江苏引往山东和天津；一条是中部的运河，将水由湖北调往北京和天津；一条西部的水路，将水由西藏引往西北各省市^⑤。东部的这条运河（将在现有的京杭大运河的基础上挖掘）已经于2002年开工挖建，而中部的运河也已于2003年开工。根据计划，西部的运河将于2010年中部运河第一期完工的时候开始挖建。

这一系列宏大的建设工程不仅将会遇到技术上的挑战，还会极具政治敏感性，在环境方面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中部的运河需要从黄河地上河的大堤下面打通穿过，而西部运河在引水时将穿越温暖地区和寒冷地区。三峡大坝建造时移民数量达110万，而这个调水工程将会是一个更大的工程。使人们非自愿地迁移肯定具有政治上的潜在风险。而在国际层面，这项工程在政治上同样容易引起争论。西部运河的设计方案需要“在雅鲁藏布江上建造大

① 中国主要的沙尘暴的发生次数在1950~1959年间是5次，1960~1969年间是6次，1970~1979年间是13次，1980~1989年间是14次，1990~1999年间是23次，而仅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2001年为26次，2002年为16次，2003年为11次，数据来源于“时间的沙持续流逝：沙漠化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吞噬健康的土地”，2005年6月16日《北京周报》。

② “数十亿棵树被栽植但是沙漠几乎没有减少”，2004年4月11日《纽约时报》。

③ “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而人类是罪魁祸首”，2002年1月30日《南华早报》。

④ 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报告（2007）指出：“降雨量的地区性分配显示，中国北方、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年均降雨量都在显著减少，平均每10年降低20~40毫米，其中北方降雨量减少得尤其严重。而中国南部、西南部年均降水量显著上升，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过去50年里，中国范围内的重大气候和天气问题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北方和西北的干旱、长江中下游和中国西南部的洪水都变得越来越严重。”

⑤ “雄心勃勃的运河网计划意在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2002年11月27日《南华早报》。

坝然后每年转移 2000 亿立方米的水进入黄河”，这一计划被称为“使印度政府夜不能眠”的计划^①。

许多反对这项调水工程的人士认为节约用水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目前的缺水问题，因为目前大量的水是被浪费掉的^②。而中国水利用之所以如此低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厂和家庭享用的是世界上价格最便宜的用水”^③，而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4^④。

还存在另一种令人沮丧的可能：价格机制和三条运河可能都无法解决中国缺水的问题，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除非目前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为避免在通往繁荣的路上崩溃而应该遵循的改革议程

解决潜在的硬件故障

温家宝总理为了保持产能的充分利用，实施了大规模的以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本文指出了其可能引致的两种“硬件故障”：大量的不良贷款可能致使国有银行崩溃，而救助这些银行则可能引发一场财政危机；国有部门排挤私人部门，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生产力增长放缓。中国使用的宏观经济刺激工具在短期内使产能维持在充分利用的水平上，却破坏了长期产能高速扩张的基础。

我们的建议是，中国应该用以下三个新的互相关联的增长引擎来代替目前的宏观刺激计划：（1）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出现；（2）根据未来人们的住房拥有情况来推进城市化；（3）发展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以更大程度地发挥私人部门的作用。

通过帮助在沿海省份失去工作机会的内地农民工创业，可以适当抵消国有企业的扩张。这其中很多人有足够的经验去创建自己的工厂或作坊，全球金融时期，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不断发展的国际交通运输网络给内地省份带来生产成本方面的竞争力。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信贷资金问题，政府应该立法承认中小私人银行机构，因为这类机构在满足这

① “中国的运河和大坝计划令印度担忧”，2006 年 10 月 23 日《印度时报》。

② “日益逼近的水资源短缺警告”，2004 年 6 月 10 日《海峡时报》。

③ “水资源的严重浪费将使中国很快面临严重干旱”，2006 年 3 月 8 日《南华早报》。

④ “日益逼近的水资源短缺警告”，2004 年 6 月 10 日《海峡时报》。

些新企业家的需求方面比四大国有银行更具比较优势。而这类银行的健康发展又需要强化谨慎的监管体系，同时降低对利率的管制。农用地也应该私有化，从而使创业者在向这些新的私人银行贷款的时候就有了附属担保物。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自于西部省份，政府应该首先在西部各省试验性地启动这第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引擎。

一个新的私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可以带来三个主要的好处：

-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来说，这个新的群体的消费在维持总需求的水平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与国有企业和银行相比，私人企业的生产力增长率可能更高

- 这些中小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劳动密集性

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在未来可承受的住房拥有率基础上的城市化。过去 10 年和最近出现的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增长反映的不仅仅是投机需求，其中还包含着一直被抑制的真实的购房需求——已经与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真实的购房需求。^① 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那些人无法满足从银行申请房贷所需的条件，所以很多投资者买了多套房屋并出租给那些刚进入城市的人，这些投资者还希望不断提高房租，因为这些租客的收入也是不断提高的。以此来看，近来大部分的住房需求都是投机性的。

我们建议中国大陆学习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廉租房模式，建立一个国民住房项目，这个项目允许新进入城市的人群可以租赁政府的房屋最长达 7 年，7 年之后这些人可以以建筑成本价格优先购买这些房屋。这种城市化中的“未来拥有”模式可以防止由于投机导致房屋空置进而引发不良贷款现象。中国也可以负担大规模的国民住房项目，因为在其他国家这类项目的最大成本是土地成本而非建筑成本，而在中国土地基本上都是国家所有的。^②

我们提出的城市化形式可以在三个方面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

- 通过维持房地产业的投资来供给所需要的住房，同时有助于维持目前的总需求水平

① 如果投机性需求是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主导因素，那么房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因为投资者们倾向于将他们所有的房屋都租出去）。但是，相比于 2009 年 3 月，北京市 2010 年 3 月的租金水平上涨了 19.6%。具体可见：“调研显示房屋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中国日报》海外版，2010 年 5 月 12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metro/2010-05/12/content_9839054.htm〉。

② 我们应该注意到，房地产建筑业相对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而房屋装修更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

- 通过将银行的贷款重新引导至那些由农村移居来的人群，同时建立新的住房管理机构担当中介，可以有效防止不良贷款的出现
- 这项住房计划可以将收入进行二次分配，分配给来自农村的移民（这同样有助于预防“软件故障”），这一点有助于提振消费，从而可以有效抵消当前的宏观经济刺激计划完结时给经济带来的影响

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个和第二个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是互相强化的。来自农村的移民成立自己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处于或者靠近城镇，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和集聚溢出效应。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使第二个引擎充分发挥作用而需要进行的制度调整同样有助于第一个新经济引擎的运行：农地私有化、取消户口制度、金融体系的自由化。

第三个相关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则是使私人拥有金融机构合法化。^① 健康的中小银行的出现有助于降低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因此当国有银行因不良贷款崩溃时，经济受到的影响也就要小得多。私人银行（国内的和国外的）的进入可以降低四大国有银行的任何一个存在“太大而不能倒闭”的可能，因而也就可以减少现在的寡头垄断的银行体系所享有的软预算保护。国有银行中某些部门的私有化和大的国内私有银行的出现同样有助于加强国有银行的管理者们所受到的预算约束。而一个私人部门占据主要地位的现代化的银行体系的发展还可以在增加银行贷款数量的同时提高银行贷款的质量，这相当于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资代替宏观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也降低了不良贷款的规模。^②

解决潜在的软件故障

中国目前仍然存在赤贫现象，这一情况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今的中国，继续推出更多相似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产生有益的结构，因为发展的问题已经改变了。我们在前文曾经就此举例，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通过减少经济管制）就可以有效减少贫困，而最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已经不再有很好的效果了。

更加复杂的情况是，人们现在不仅仅希望政府发挥传统的职能（例如协调水资源的使用），还希望政府在更多领域有更好的表现（例如减少收入

① 那些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尽管通常通过“法人”等政府控制的媒介持有股权）不列入我们所说的私人银行的范围之中。

② 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和金融体系监管模式也需要进行改革，以减少不断对国有银行注资和重组的现象。

分配不公)。

最近中国农村地区出现的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就是在将农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的时候没有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于2006年1月联合签发的“一号文件”宣称不仅要“稳定和监管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并加快土地流通改革”，还要“扩大农村地区的民意传达通道并改进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政府承诺给予农民更大的发言权”，《南华早报》，2007年1月30日）。^①

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从而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最终赶上美国，民主、法治、消除腐败、土地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要避开软件障碍肯定要比避开硬件障碍更加困难，因为政治改革是政府“软件”进行成功配置的核心。而中国治理“软件”的现代化需要实行自由选举、言论出版自由和独立的司法审判。

解决环境退化导致的动力不足问题

制定环境领域的有效政策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多科学我们还不清楚。例如，现在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中国排放的大量炭黑（未经充分燃烧的碳颗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气候模式改变，从而致使北方干旱而南方频发洪水（Menon 等，2002；Streets，2005）。大众媒体所称的“亚洲黄云”的最大来源就是中国和印度燃烧煤和化石燃料。污染和水资源短缺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降低了通过价格机制或者三条运河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可能性，除非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根本性的修正。

中国不能再分别制定实施水资源战略和能源战略了。在政策制定方面必须采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政策产生的结果之间是有联系的，这极可能导致意料之外的环境破坏。如果中国的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就需要重新考虑人口中心的位置和各国在全球气候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

中国面临的一个不利的现实是，除非在中期内重塑生态平衡，否则环境的限制将会中断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一个不利的现实则是，从地理上来看的一个大国若发生严重的环境恶害，其负面影响将不会仅限于一国之内。中国不断恶化的沙漠化首先给北京带来了越来越频繁的沙尘暴，而且自2001年4月起，中国的黄色灰尘不仅开始漂洋过海影响到了

① 作为一号文件签发意味着这将是新一年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日本和韩国，甚至越过大洋到了美国。中国的环境治理现在不仅关系到中国，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福祉。

当我们讨论调水计划的环境影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注意到，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对这个重要的政府设施项目进行公开争论，而且这种争论不仅仅限于技术人员之中。这些争论的公众性（这些争论涉及的不仅仅是科学家、工程人员和经济学家），表明社会对环境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发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公众预期的这种转变需要中国政府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任何政府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哪怕它们很希望这样做。因为绿色增长政策涉及体系化的方法以及科学性地理解许多生态子系统，同时，我们对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的理解也不完全。

全球环境是中国可以协助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体系的领域。^① 具体来说，中国应该调动全球达成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国际研究联合体以研发清洁燃烧煤的技术，因为中国现在平均一个星期就新建一座火电站，因此中国有更多的机会来试验清洁燃煤技术。此外，考虑到中国和周围许多国家出现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尤其在中国北方），中国应该筹办一个区域性的研讨会，在情况恶化之前，联合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来自西藏高原的水。中国还应该调动和促进建立一个区域性研究机构来研究海水淡化饮用技术。如果清洁能源研究和海水淡化研究方面的全球合作取得成功，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经济动力不足问题

最后，我们主要探讨一下怎样减少这辆正在加速的汽车（也就是中国）撞上一个路障（而且是以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出现的路障）的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自从20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的非议越来越多，而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些不满进一步加深。中国被指控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负有责任，例如，中国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便宜的信贷从而导致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②，中国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其实是一种以邻为壑

① McKibbin 等（2008）提出了一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采用的达成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协议的例子。

② Nicholas Lardy 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说“我们美国是一个对消费上瘾的瘾君子。而中国则是‘毒贩子’，他们向我们提供信贷，这样就使得我们过度消费成为可能”（“中国与美国关系匪浅”，Winter Institute，在2009年2月27日美国明尼苏达的 St Cloud 大学研讨会上发布，2009年3月2日正式发表，<<http://www.stcloudstate.edu/news/pressreleases/default.asp?storyID=28126>>）。

的贬值政策^①。

中国经常账户的长期盈余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和私人部门的储蓄总额超过了他们的投资消费总额。长期大规模的贸易顺差揭示了中国经中一个深层次的、严重的问题：金融体系的功能失调（Liu 和 Woo, 1994）。中国之所以产生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金融中介和产品。而之所以这些盈余随着时间不断增长，则是因为功能失调的金融体系无法分散风险以减少为防止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也没有能够成功地提供贷款来减少那些为投资进行的储蓄。解决中国的过度储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中介机制来协调私人储蓄和私人投资。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也必须指出，贸易的不平衡反映的是两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果美国不是储蓄不足的话或许中国就不会出现过度储蓄。对于两国的贸易紧张局面，美国的肆意挥霍与中国的勤俭节约一样应该首先受到指责。此外，正如 Woo（2008）所指出的那样，即使中国的贸易平衡表上贸易没有顺差也没有逆差，美国依然会遭受技术创新所导致的结构调整和收入再分配的痛苦，美国的制度变革也会发生，全球化和移民进入美国也同样会出现，相比于贸易赤字扩大，美国工人因这些问题产生的愤怒和不满会更多。

如果现在美国加强自己的社会保障网络建设，从而降低更换工作的成本的话，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便有望得到缓解。特别是，美国国会应该加快降低财政不平衡状况并扩大贸易调整项目，尤其应该提高年轻工人的技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中国和美国都实施正确的政策而非只有中国行动的话，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才有可能得到缓解。

为了缓解因贸易不平衡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关系，中国和美国除了应各自独立采取行动之外，还应该共同努力以防止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GATT-WTO）的自由贸易机制弱化。尤其是，中国从 WTO 体系中获益良多，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顺利完成方面所起的作用却很小。正因为中国的缺席，巴西和印度在贸易谈判中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根据 2007 年 G4（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波茨坦会议中的美国贸易代表 Susan Schwab 的说法，巴西和印度收回了它们此前作出的削减制造业关税的承诺（该承诺是以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为交换得出的），并声称是因为

① “中国会服从吗？”，2010 年 3 月 17 日《纽约时报》。

“害怕会导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①。

随着美国保护多变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不断减弱，中国应该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变得更加主动，从而使世界贸易可以在减少贸易管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样的角色将很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目前巴西正在通过与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来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事实上，越来越多像巴西一样的国家“都越来越对一些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因为这类协议往往要求削减关税，而这会使得这些国家更进一步陷入与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中。相反，这些国家正在寻求与富裕国家签订只符合双方需求的双边协议”^②。现在是时候轮到中国站出来加入多边贸易体系之中，从而显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这种国际姿态同样可以减少这类问题对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且这类问题的影响就属于经济动力不足问题的一种。

结 论

据我们的估计，中国经济这辆汽车出现“软件故障”或者“动力不足问题”的可能性要高于其发生“硬件故障”的可能，因为前两种问题相对来说更加难以解决。对于大部分“硬件故障”，中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学习应对方法，特别是东亚比较富裕的国家，而且中外在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意识形态差异正在缩小。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经济追赶方面取得了成功，其敢于实施和采取“最好的国际化实践”的思路也适用于中国。

处理“软件故障”比处理“硬件故障”更困难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发展政策的制定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因为随着人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越来越多，民众对于政府的管理工作也抱有越来越高的期望。

第二个原因是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有效的重新配置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度娴熟的政治技巧，还需要有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温和的国际环境，而后两个因素是大多数政治家们所难以掌控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足够自信，也取决于其是否有足够的技巧来引领民主变革并能在变革

① “Schwab 对印度和巴西的立场感到惊奇”、“中国阴影笼罩着多哈的失败”，2007年6月22日《金融时报》。

② “巴西——将多哈脱离原本贸易协议的国家”，2007年7月5日《华尔街日报》。

后继续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幸存下来。历史告诉我们，法国的君主和英国的君主在面对民众要求改革管理体制的呼声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当然结局也是非常不同的。

解决发展动力不足问题比解决“硬件故障”问题更加困难，这是因为解决动力不足问题通常都需要进行一些迄今为止在世界上还绝少有成功经验的工作，有时还牵扯到一些强大的外国合作者，而本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甚至互相之间还存在隐性的竞争，有时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可能会同时面临所有这些问题。解决动力不足问题需要国际各方的高度合作，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比较孱弱，从而无法实际参与国际合作，如果要想在更多问题上形成合作局面，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就需要重新考虑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责任问题。^①

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一股重要力量，中国社会中也正在拥有越来越多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使得实行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成为必要，这种新战略除了保持经济发展以外，还应该强调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和一个和谐的世界，而这需要中国改善管理体制，同时还需要全球为之提供动力和支持。

（王之堂 译）

参考文献

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07, Key Indicators: Inequality in Asi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anila.

① 有关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的最新探讨可以参见 Garnaut 等人（2009）的论文集中的文章，例如 Woo（2009）的文章。中国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汇率机制上的争论就体现了处理一个“动力不足问题”所具有的困难。就这个问题，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使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但是这种解决方式是典型的欠缺全面考虑的一个实例（其他例子还包括，仅仅建设运河从南方向北方调水是不全面的，中国还需要减少碳排放并集中关注南部的城市化问题）。具体来讲，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一种经济上更有效率同时政治上更加友好的解决方法需要以下条件：（1）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贸易不平衡（也就是说，不仅仅对人民币进行升值，还需要中国政府使采购政策自由化，同时，美国政府也需要努力扩大出口）；（2）如果问题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政策，那么所需要的就不仅是一方调整政策了（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需要实施正确的政策，而非只有中国需要行动）；（3）需要追求的不能是一个单一的政策目标，而应该是一系列更加直接的福利目标（也就是说，不仅要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还应该加强 WTO 的裁决体系，并使所有国家的 GDP 增长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上）。

2. Becker, Jasper, 2003, "The death of China's rivers," Asian Times Online, August 26.
3. Chang, G. 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Random House, New York.
4. Démurger, S. , Sachs, J. D. , Woo, W. T. , Bao, S. , Chang, G. and Mellinger, A. 2002,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 no. 1 (Winter), pp. 146 – 97.
5. Economy, E. C. , 2004, *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NY.
6. Forsythe, M. 2009, 'Is China's economy speeding of the rails?', *The New York Times*, 23 December 2009.
7. Garnaut, R. , Song, L. and Woo, W. T. (eds) 2009,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ANU E Press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Canberra and Washington, DC.
8. Lardy, N. R. 1998,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9. Liu, L. – Y. and Woo, W. T. 1994, 'Saving behavior under imperfect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consequences', *Economic Journal*, vol. 104, no. 424 (May), pp. 512 – 27.
10. McKibbin, W. J. and Woo, W. T. 2003,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its neighbour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2, no. 2 (Spring/ Summer), pp. 1 – 38.
11. McKibbin, W. J. , Wilcoxon, P. J. and Woo, W. T. 2008, 'China can grow and help prevent the tragedy of the CO₂ commons', in L. Song and W. T. Woo (eds), *China's Dilemma: Economic growth,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sia Pacific Press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Canberra and Washington, DC, pp. 190 – 225.
12. Menon, S. , Hansen, J. , Nazarenko, L. and Luo, Y. 2002, 'Climate effects of black carbon in China and India', *Science*, vol. 297, no. 27 (September), pp. 2250 – 3.
13.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2007, *China's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Jun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4. O'Neill, J. , Wilson, D. , Roopa, P. and Stupnytska, A. 2005, How solid are the BRIC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34*, 15 December, Goldman Sachs, New York.
15. Sachs, J. D. and Woo, W. T. 2000,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vol. 4, no. 1, pp. 1 – 50.
16. Shih, Victor, 2010, "China's 8, 000 Credit Risk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8, 2010.
17. Streets, D. 2005, 'Black smoke in China and its climate effect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4, no. 2 (Spring/Summer), pp. 1 – 23.
18. Tong, J. and Woo, W. T. 2006, 'Keeping fiscal policy sustainable in China', in

-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19. Woo, W. T. 2001, 'Recent claims of China's economic exceptionalism: relections inspired by WTO access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s 2 – 3, pp. 107 – 36.
20. Woo, W. T. 2006, 'The structural natur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4, no. 1 (February), pp. 1 – 20.
21. Woo, W. T. 2008,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of friction in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the exchange rate debate diverts attention away from optimum adjustment',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7, no. 3 (Fall), pp. 65 – 99.
22. Woo, W. T. 2009,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ancial reform', in R. Garnaut, L. Song and W. T. Woo (ed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ANU E Press an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Canberra and Washington, DC, pp. 15 – 32.
23. Woo, W. T. and Xiao, G. 2007, 'Facing protectionism generated by trade disputes: China's post-WTO blues',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24. Woo, W. T. , Li, S. , Yue, X. , Wu, H. X. and Xu, X. 2004, *The poverty challenge for China in the new millennium*, Report to the Poverty Reduction Taskforce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Proje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